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探析

刘海霞^{1,2}, 王宗礼¹

- (1.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2.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50)

摘要: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为民谋利为基点和归宿,科技进步为支撑,生态治理为保障,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环境问题;科技进步;生态治理;协调持续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6-0219-05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检验一个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雄才大略和独特的理论勇气与求实精神,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现实性,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一、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一)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然而,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人类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并不断恶化,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日渐凸显,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它表面上直接危及到人类的身心健康和

生活方式,导致生态失衡以及一个个生命物种的灭亡;从长远看,它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乃至影响人类生态文明的走向,威胁和挑战人类前途。环境问题因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危害程度的严重性,以及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

其次,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是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总结我国急于求成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生态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执行“以粮为纲”的片面指导方针与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政策,只考虑人的吃饭问题,忽视了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风沙、水旱等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如何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关心和思考的一件大事,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内历史背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进行了生态环境的“拨乱反正”,主张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党的十四大还把加强环境保护列入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

收稿日期: 2014-03-04; 修回日期: 2014-0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及其防控机制研究”(11CZZ02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承续及现实价值研究”(13XKS001)

作者简介: 刘海霞(1977-),女,甘肃陇南人,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环境政治学;王宗礼(1963-),男,甘肃金昌人,法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

特有的生态思想。

(二)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它的产生不仅是消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和国内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等现实原因的迫切需要,而且有其深广的理论来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续承以及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智慧的广泛吸收和借鉴。

首先,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续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休戚与共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地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休戚与共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大自然中孕育而生的,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3](63)};“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7)};而且“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3](63)};“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水、无害的食物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虽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5],人类可以借助这种力量改变自然,使自然变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化自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邓小平的生态思想正是在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实践,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邓小平思想广泛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生态智慧。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各种自然观内在凝聚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和辩证把握,蕴含着丰富的值得推崇和弘扬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比如,人类早期基于对神秘的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迷信所表现出人类对自然之母“又爱又恨”“又惧又畏”的神话自然观;古希腊摆脱

神秘力量并以整体的视角审视和关照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自然观;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中体现出的不违天,不违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为一体,道家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佛教文化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伊斯兰教文化的真主创造万物,并使万物各得其所,协调有序,相互依存,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员,人要敬爱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等思想,都无一例外地折射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敬畏和顺应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另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因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而兴起的各种新兴生态理论如生态政治学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生态社会学理论等都是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和丰富养料。

二、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为民谋利: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基点和归宿

紧紧围绕“人民利益”开展一切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领袖,他深知,只有“那些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7]。因此,他在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时,始终把“为民谋利”作为其基点和归宿。他指出,各项工作包括农业、能源、人口、环保等基本问题“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生产建设和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981年七八月间,四川省发生特大洪灾,波及135个县、市,1180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直接经济损失10多亿元,这都是由于上游山区的毁林开垦和森林的过量采伐,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的。水灾过后,邓小平提出了全民义务植树的倡议,并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1982年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人民。”^{[8](21)}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来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指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黄’河,

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9]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植树活动,告诫植树的全体同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件大好事,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0]

此外,邓小平还坚持生态环境建设和富民创收相结合的原则,主张建设、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开发旅游资源,追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造福人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对旅游总局和民航总局的负责人讲,“民航、旅游很值得搞”,“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他当时还算了一笔帐,一个旅游者1000美元,接待1000万个旅游者,就可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邓小平对国务院相关领导同志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11](116)}“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8](21)}1979年邓小平去安徽视察工作时,对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的有关负责人说:“这里(黄山)发展旅游是个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外国人到中国旅游,有时花钱少了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把交通、住宿、设备搞好”,“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旅游的牌子打出去”。^{[11](116)}事实证明,经过30多年的开发和建设,黄山已成为中国旅游的一颗明珠,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富民增收的旅游名牌。可见,紧紧抓住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开发和保护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原则。

(二) 协调持续: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人口、资源和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首先,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丹尼斯·米都斯等科学家在《增长的极限》中指出:“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会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12]人口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幸运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对我国的人口问题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心和忧虑,首次提出了节制生育主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是把人口问题置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资源有限性的战略高度,审

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他指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3](164)}邓小平在论及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时曾多次提到,人口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14](126)}。否则,人口过多过快增长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巨大压力,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影响中国“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制约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因此,“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14](112)}。

其次,尊重并顺应自然,推进现代化建设。长期以来,自然从属于“人类”,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化并被沦为工具性资源,仅仅成为其主人需求和欲望的对象^[15]。我国著名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阳含熙院士曾郑重地告诫人类:“自然界是平衡的,天生我‘物’必有用,所有生物都是有用的,只是用处各有不同。每个生物圈保护区的生物资源都不能破坏,一旦破坏就永远无法恢复了,因为物种是不能创造的。所以,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要把自然当成工具,随便像汽车一样,不行再换一个。”^[16]邓小平认为,人类应该摒弃“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仆观念”,应该尊重并顺应自然。他从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肯定生态环境的价值:“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管理好我国的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17](20)}针对“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的现状,邓小平强调要从人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远景规划,他指出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356)},从而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关系。

再次,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和保护相结合,彰显生态环境的地位和作用。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和保护相结合,彰显生态环境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意义。因为“经济增长至高无上的优先性虽然是20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但是任何按指数形式出现的增长到了某个时候都必然会趋向于平伏,否则会发展到荒唐的程度,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给自然环境带来难以估算的破坏”^[18]。“生态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过度开采,导致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平衡被打破,那么经济

增长,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19]1990年,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就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进行谈话时,就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置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核电、油气开发、铁路公路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对这次统一思想,是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核电站我们还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8](363)}邓小平还敏锐地洞察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减少自然灾害、拓展生存空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因此,早在1978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林业建设,他强调要“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17](39)}。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明确指出“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邓小平确立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思想,充分展现了他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努力、勇气和智慧。

(三) 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有益支撑

邓小平主张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表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改善生态环境、控制污染的有益支撑。正如美国学者伊夫林·舍克所指出的:“技术已给我们的生活与时代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各个领域的挺进已日益地改变、修正和更换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可供行为与选择的迥然不同的世界。”^[20]邓小平认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丰富多样的劳动资料,更需要其生物劳动对象的变革及其与生态环境系统适应。他指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13](28)};“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8](312)};“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8](17)}。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生物技术,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983年,他和胡耀邦等同志谈话时强调:“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21]“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技术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8](275)}。为了达

到既保护环境又增产增质,邓小平要求通过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研制出安全农药取代高毒低效的农药,发展绿色农业。因为高毒低效的农药不仅会带来土壤、水源、空气污染,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且会影响粮食食用安全,危害人类健康。因此,邓小平积极主张依靠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四) 生态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保障

20世纪70年代,面对中国开始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需要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制度约束。邓小平主张将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和有法可依。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同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谈话时指出:“是否可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颗树,比如种三颗或五棵树,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国家在苗木方面应给予支持,是否提出个文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或者由人大常委会通过,使它成为法律,及时施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22]1982年12月26日他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这件事(指植树造林),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8](21)}我国第三次修订后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在邓小平的重视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不仅首次被提升到了宪法的战略高度,而且在此基础上我国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对建设、保护、开发和利用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倡导下,1987年,我国的环境保护局被提升为国务院管理的副部级单位,为环境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以及执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这样就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三、小结

邓小平以为民谋利为基点和归宿,科技进步为支撑,生态治理为保障,旨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是对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重要结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理论上,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上,邓小平的生态思想为我国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是新时期实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对于我国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刘海霞. 环境问题与政府责任[J]. 甘肃理论学刊, 2013(2): 27-3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3.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5.
-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28-92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7.
- [10] 翟泰丰,鲁平,张维庆. 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793.
- [11] 赵林余. 旅游法概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 [12] 丹尼斯·米都斯. 增长的极限[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8.
-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 邓小平年谱·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5] 乔尔·科维尔. 马克思与生态学[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5): 199-203.
- [16] 阳含熙. 留住原始[J]. 人与生物圈, 2006(9): 卷首.
- [1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 [18] 马道明. 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经济调控范式的反思与重构[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11): 180-185.
- [19] 李继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旨趣与启示[J]. 社会科学家, 2013(8): 19-22.
- [20] 伊夫林·舍克,肖巍. 伦理学的新领域——伦理与环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1(2): 59-62.
- [21] 邓小平年谱·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82.
- [22] 邓小平. 论林业与生态建设[J]. 内蒙古林业, 2004(8): 卷首.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LIU Haixia^{1,2}, WANG Zongli¹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730070,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the Technology of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which Deng Xiaoping carried on,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ts basic point and the end-result was benefiting the people; its support w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s guarantee was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its core was to realiz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Deng's ide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ill shines with the brilliance of the truth.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logic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编辑: 颜关明]